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维视野的大明帝国/朱子彦著. —合肥:黄山书社,2009. 10

ISBN 978-7-5461-0802-5

I. 多… II. 朱… III. 中国—古代史—研究—明代 IV. K248.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79438号

书 名:多维视野的大明帝国

著 者:朱子彦

责任编辑:张向奎

封面设计:钱志刚

出 版:黄山书社

社址 合肥市圣泉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

发 行:新华书店

印 刷:合肥瑞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00mm×1000mm 1/16

印 张:25.25

字 数:375千

版 次:2009年10月第1版

印 次:2009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2.00元

本书获得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第五期）「近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史」（J50106）的资助

自序

我步入明史研究领域并不算晚，至今算来也有二十多年了，但我在这个领域中始终算不上是正规军，而只能算是一个散兵游勇。记得1985年，我参加了于安徽黄山召开的国际明史学术讨论会。那时，中国明史学会刚成立不久，黄山会议大概是第二届国际性的明史大会，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教师能应邀参加这样一个重要会议，也算是不胜荣幸了。如果沿着这条道路毫不动摇地走下去，大概我也能是这个领域中的老兵了。然而，深感愧疚的是，自己并没有能始终如一、持之以恒地研究明史。由于我治学范围较为广泛，故在中国古代史的领域中经常转移阵地。上一世纪九十年代前，我曾经把注意力集中于探究明史，自九十年代始，我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步入新世纪后，又开始致力于秦汉三国史的研究。如此一番折腾，本人似乎已逐渐淡出明史学界。

屈指一算，我大概已有十多年没有参加明史学术会议，倒不是学会把我忘了，而是我自己的“过失”，有好多次，当我收到学会的会议通知时，总是在去与不去之间，左右彷徨，犹豫难决，而最后却是自己将自己开除出会。何以如此呢？因为我看到在最近十多年中，明史学界后生可畏。有不少年轻学者对明史研究已作出了相当卓越的贡献，他们已经站在明史研究领域的前沿。相比之下，我自觉汗颜。故暗下决心，在拿不出相应成果的情况下也就不必厕身其中，忝列这一领域了。最近蒙黄山书社编辑张向奎兄的盛情约稿，使我有机会，将历年草就之若干论文汇集纂成一本专著。这就给我重返明史学界提供了一个契机，同时也使我有机会对自己以往的学术生涯作一个阶段性的小结。

拙著之所以冠名为《多维视野的大明帝国》，主要是因为本书并非是对

某一专题的专门研究,而是将以往发表于各个学术刊物上的论文整合成六个部分。内容涉及明代的创业之主与守成之君、明朝的内阁与党争、后妃制度与后宫政治、新藩镇的崛起、由火器发展而引起的新军事领域的变革、南北海运与南粮北调、经筵与科举制度、强化皇权的工具——铁券制度,以及江南市镇与明朝社会经济变化等诸多专题。这六部分的内容虽然各自相对独立,但整合在一起亦可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系列。大明帝国的历史当然是一个整体,但诸多论著常把关注点放在明朝发展的历史进程。本书不再重复这些进程,而是把注意力、聚焦点集中在明朝社会不同于以往朝代的特征和特质,著者本意是力图将大明帝国置放于多维的视野之下,进行各个侧面的解读,其宗旨是不求其全,而求其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程度的创新,至于是否如意,尚待专家及读者鉴定。

大凡学术专著由于其篇幅较长,学术性较强,故一般读者往往不胜其烦,很少能娓娓细读,故书中虽有精彩独到之处,也常被繁文缛词及引证的大量史料湮没其中。为了能适当改变这种状况,作者最好在序言部分就亮出该书的主要观点,因为就一般情况而言,读者习惯在开卷时先翻阅一下书中的前言部分,通过较简便的方式来作出对此书的审视和判断。为了节省读者宝贵的时间,我试图以较短的篇幅对本书的基本内容及观点作一简单介绍:

第一章主要是论述明朝的创业之主与守成之君。明代的开国之君是朱元璋,朱棣在乃父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明朝的事业,故亦可算是明朝半个创业之主,朱元璋、朱棣父子创建和巩固明王朝,文治武功赫赫。本书对他们的创业事功不再赘言(因这方面的著述颇丰),而关注的是朱元璋在建立大明王朝后,对明朝政治体制的变革,胡蓝党案是明初最大的政治事件,前辈学者吴晗对此已作了相当精深的考订,然犹有未曾涉猎者,即胡蓝党案对明代政治的影响。明帝国与前朝政体最大的不同点在哪里,我以为,就是明朝不设宰相,将官府与相府合为一体,相权与君权合二为一。自此,明代皇帝成为帝制时代权力最大的君主,而这个变革正是朱元璋以胡蓝党案为突破口来完成的。

朱元璋是马上天子,其创业之路和刘邦、曹操一类的君主并无太大的区

别,但他废宰相,设置特务机构——锦衣卫,滥施廷杖却迥异于前代。钱穆先生对中国古代社会的传统政治有其独特的看法,他不同意把自秦以降的整个帝制社会皆称之为专制政体,而是作了不同时间阶段的划分,例如他把秦汉社会称为“平民社会”、“士人政府”,称北宋社会为“文官政治”、“贫弱的新中央”,而称明代为“君主独裁政体”。虽然钱先生之观点并没有被大多数学者所认同,质疑之声也屡屡见诸于史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明代政体是不折不扣的君主独裁专制政体,而这个转折点就始于朱元璋一手制造的胡蓝党案。

朱棣发动“靖难之变”后,所作出的最重大举措之一就是迁都。虽然辽、金、元三朝皆以北京为首都,但其重要性还未充分凸现出来,朱棣迁都北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摆脱夺取其侄皇位的阴影,实现“控四夷以制天下”的宏伟目标,对明代政治、经济、军事的影响不容低估,在历史上应有浓墨重彩的一笔。

有些学者往往低估明朝守成君主的历史功绩,殊不知明朝的守成事业是相当出色的,前有仁宣之治,后有弘治中兴,与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清朝的康乾盛世相比,并不逊色,皆是小农社会的盛世。仁宗、宣宗、孝宗是明朝很有作为的君主,他们兴利除弊,励精图治,对太祖、成祖之后明王朝的内外政策进行了适度的调整,体现了皇权政治对稳定社会、繁荣文化、发展经济的调控功能,使大明帝国重新获得了勃勃生机。所以千万不要一刀切,把明清二个王朝的帝王简单地对立起来,一味地强调清朝君主个个都是勤劳政事,乾纲独断,而明代诸帝都是昏庸无能,不理朝政。若明朝皇帝皆不如清朝君主,何以大明帝国能绵延几近三个世纪,比之于清朝,国祚还多了十年(还不算南明诸政权)。

第二章主要是论述明朝中枢机构的党争。中国传统政治中历来都有朋党之争,东汉的党锢之祸,唐代的牛李党争,宋代的元佑党祸便是典型之例。朱元璋鉴于历史的教训,在他亲自制定的《大明律》中,严禁臣下朋党比周,犯者一律置之重典。然有明一代党争的激烈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王朝,这和明朝建立的内阁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朱元璋罢中书省,集皇权与相权于一身,废掉了中国近两千年的宰相制度。为了填补中枢机构出现的

权力真空，朱棣将内阁变成了皇帝的秘书处。但事与愿违，新建立的内阁反而成了党争的战场。自明中期始，珰阁表里、阁臣倾轧、首辅阁部之争无休无止，朋党参与其中，造成政坛的一片混乱。中国两千年的帝制社会之所以能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其实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发达的行政官僚制度，其中丞相一职，乃为百司之首揆，理论上应代表整个文官集团的意旨，举足轻重。古谚云：“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直到明末，黄宗羲著《明夷待访录》，对丞相之职仍特别看重，他对明太祖废相切齿痛恨，愤慨地写道：“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持相同观点的还有近人钱穆，他在《国史大纲》中云“有丞相即非君主独裁，即非专制”，从而得出明代之所以为君主专制政体，乃是废相之故。

废相固然是明朝党争酷烈的原因，但值得注意的是：朋党现象乃是封建王朝的痼疾，即使对东林这样的士林清流也不宜评价过高。东林在与阉党的斗争中，最后是一败涂地，然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东林党咎由自取，因为在他们短暂的执政过程中，并不以朝政国事为重，而是党同伐异，一味地排斥异己。在明季党争中，东林党人负有相当大的责任。当时人就有过较为公允的评判：“东林亦有败类，非东林亦有清操独立之人”，可见，封建王朝一旦进入后期，传统的政治结构就不会再有生机，即便像东林党这些开始还充满救国救民理想的士大夫，最终也不得不走上旧的历史轨迹。

第三章是论述明朝的后宫政治。明代后宫制度是明代极端君主专制独裁体制的重要体现。明代后宫制度不仅反映了宫廷文化，也折射出明代制度组织体系、治国理念、思想文化方面的时代特色。明统治者强化封建等级制度，使后宫制度与君主专制政体配合得更为紧密。明代后宫制度与前朝最大的区别就是盛行十分残酷的“生殉”陪葬制度。受宋明理学思想的影响，明代不仅提倡妇女从一而终，夫死不得再醮，甚至提出以身殉夫，用生命来捍卫贞节。明代统治者尤其强调女子对丈夫的顺从，所以在皇帝丈夫死后，主动殉夫就成为妃嫔们追求的崇高妇德，成为“母仪天下”的最佳方式、最高典范。宫廷殉葬就是在妃嫔的自我表率 and 统治者的要求之下极大地盛行起来。

朱元璋虽将禁止后妃干政奉为祖宗家法，然有明一代，后妃仍以特殊方

式参与国事,并对皇位继承及朝政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和影响。例如在万历朝的政局演变中,李太后就是一位关键人物,没有她做张居正的后盾,便没有张居正变法革新的巨大成功。而明末“三案”亦同郑贵妃阴谋夺嫡有关。本书将后宫制度与“家国一体化”的君主专制政体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试图总结出后宫政治对明王朝治乱兴衰的影响。

第四章是论述明代皇权之盛衰。明代统治者加强专制皇权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本书选取明代特有的铁券制度作典型解读。“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是君主专制社会的至高法则。由于天下臣民的生死荣辱皆操之于人主之手,因此君主给勋臣以生的权利,“许之以不死”,在当时人看来,就是莫大的恩赏。所谓铁券,乃是帝王颁赐给功臣带有盟誓性质的一种特权凭证。获得铁券者可以在皇帝允诺的范畴内免死若干次,其免死特权可荫及子孙。然而铁券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未形成规范化的制度,这与皇权不够强大有关。例如,魏晋南北朝时期,权臣跋扈,不少君主连自己性命都朝不保夕,又怎能掌控臣工的生杀之权。因此,铁券的免死功能或有或无,免死次数或多或少,毫无规章制度可循也就不足为怪了。帝制社会进入到明代,皇权空前加强,铁券形成了规范化的制度,以此来维护皇帝和贵族之间的君臣关系。明初的功臣勋贵都有铁券,明太祖对铁券的免死功能作了详尽的规定。当然其免死是有条件的,即“谋逆不宥”。然而这仅是一种表象,但凡贵族有削弱皇权的行为,皆可被视为“谋逆”,而处之以极刑。从铁券的滥觞、嬗变,最后进入法制化的轨迹来看,其与皇权政治发展的脉络完全吻合,这就使明代皇帝进一步掌控了臣下的生杀予夺之权。

重文轻武,以文官治国不仅是宋代,也是明代的祖宗家法。明初为防止武将擅权,其制约手段远远超过了汉、唐、宋等王朝,明代作战统帅多为文官,武官低人一等。晚明更以宦官监军,统帅动辄受制,不成体统。统治者虽煞费苦心地防止军阀势力的产生,但明末动荡的战乱局势为武将势力的上升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因此出现了以左良玉、江北四镇为代表的军事集团。左良玉拥兵八十万,公然打出“清君侧”的旗号,足见其军事实力已强大到不把南明弘光政权放在眼里。如果不是清兵进关,定鼎中原,左良玉这股军阀势力就很可能发展成类似于唐末五代时期的藩镇割据。明末皇权衰

落,祖制家法遭到破坏也就成了必然的趋势。

第五章主要检讨明代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曾经是中世纪最先进的选官制度,但至明代已趋于烂熟而式微。明世宗登基之初,为刷新政治,巩固皇权,对科举制度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改革,这次改革虽然对明代后期的科举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带来的改革成果却极其有限。其原因是科举制已经完全走向程式化、固定化,很难再有发展的空间。至清末,虽然要求再度改革科举制的呼声日益高涨,但却在1905年清统治者实施新政时,彻底废除了科举制。因为当时士大夫中的有识之士已充分认识到,早在明代晚期,科举制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

东林党之后最著名的文人社团就是复社。复社的影响在晚明十分巨大,士子都以不入复社为耻,他们继承东林的政治思想,讥弹时事、臧否人物、干涉朝政,成为明清鼎革之际政治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复社何以会显名于当时社会呢?我认为,这是因为复社在科举制度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复社成员在崇祯时期的科举考试中考取进士及举人者达四百余人,甚至还曾囊括甲科三鼎甲。正因为有在科举上的成功,复社才得以吸引众多士子的加入,从而成倍扩充了自身组织的规模,同时,复社成员通过科考进入官场,也增强了朝廷中的清流力量,影响了晚明政局的走向。

第六章为近世社会的胚胎,重点考察明代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历程。在西方著作中“近代化即是西方化”,这个观点自十八世纪以来就占有统治地位。然而,我认为中国社会近代化的道路,还是应该在中国社会的内部来寻求。在有明一代将近三个世纪的岁月里,中国的经济、文化,包括军事科技都发生了“天崩地坼”的变化。因此,对明代社会进行具体考察,有助于深入了解中国近代化的历程。

江南地区,特别是长江三角洲一带,自明中期开始已经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新气象。地理大发现后的全球经济带动了明代的进出口贸易,源源不断流入中国的白银,为明代社会的银本位货币体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由于生丝、丝绸、棉布、瓷器等商品出口的持续增长,这种“外向型”经济极大地刺激了东南沿海地区商品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市镇的蓬勃发展。江南市镇的勃兴,基本上都建立在江南农业与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不像县城以

上的大中城市,都是统治者的政权堡垒和奢侈消费中心,具有病态的特征。

上海是中国,也是世界著名的大城市。上海是如何发展繁荣起来的?这是地方史研究中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在书中,我试图就上海几千年发展中的一个横断面,即对明代的上海县、松江府(明代上海地区属松江府)的经济发展作一概述,以证明早在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经济已走在全国的前列。同时上海也是中国最早通往世界的口岸之一,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上海人无论在思想理念还是在时尚习俗、社交礼仪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虽然明清王朝都采取闭关锁国政策,但也不能阻止上海逐渐融入世界的步伐。

我在本书中除了对明代政治、经济、社会诸多历史现象进行考察,还花了一部分篇幅介绍了明代军事变革的情况。由于北方女真族的日益强大,明军在辽东战场上连连失利,故明末君主下达了从速采用西式銃炮的谕旨。徐光启力主购置和仿造红衣大炮,抵御日益强大的“东虏”。红衣大炮在明清之际的战争中大显神威;袁崇焕用西洋火器轰击八旗军队,打得清兵人仰马翻,连努尔哈赤也中炮负伤,不治身亡。万历至崇祯年间,明朝引进西洋火器,“师夷之长技”,跨出了从使用刀枪弓弩的冷兵器走向使用火炮、火銃的热兵器时代的第一步。中国的新军事变革由此拉开了序幕。

朱子彦

己丑年孟秋写于寓所

目 录

第一章 帝国创业之主与守成之君 / 001

第一节 罢相尊君：朱元璋与“胡蓝党案” / 001

一、“胡蓝党案”真相 / 001

二、“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半淮人” / 007

三、构建独裁政体的需要 / 013

四、“胡蓝党案”对明代政治的影响 / 020

第二节 “天子之居”：永乐帝迁都北京 / 023

一、“控四夷以制天下” / 023

二、迁都的历史功绩 / 026

第三节 帝国修复机制：“仁宣之治” / 032

一、兴盛与危机并存下的皇权调控功能 / 032

二、兼听纳谏，任用贤才 / 037

三、恪守《皇明祖训》，继续加强皇权 / 040

第四节 王朝调节功能：“弘治中兴” / 046

一、成化时期的腐朽政局 / 047

二、除旧布新，厘革弊政 / 048

三、奋发有为的守成之主 / 053

第二章 帝国中枢机构的党争 / 057

第一节 制衡中枢:内阁与党争 / 057

一、内阁体制是党祸之源 / 059

(一) 违悖祖制的内阁擅权 / 059

(二) 内阁首辅之争 / 065

(三) 阉宦执掌中枢与珰阁表里 / 071

二、万历、天启、崇祯三朝的党争个案 / 080

(一) 沈一贯同沈鲤的阁权之争 / 080

(二) 阉党的鹰犬:魏广微与顾秉谦 / 083

(三) 温体仁与周延儒的首辅之争 / 086

三、内阁陷入党争的恶果 / 090

第二节 以卑临尊:科道官与党争 / 098

一、科道官在明初的积极作用及陷入党争的缘由 / 099

二、科道官参与党争的形式 / 107

(一) 各为其主,甘当鹰犬 / 107

(二) 独立结党,自谋利益 / 111

(三) 转投阉党,为虎作伥 / 117

三、科道官参与党争的后果 / 121

四、余论 / 129

第三章 帝国的后宫政治 / 133

第一节 后妃宫人的来源与女官职掌 / 134

一、采选后妃与秀女 / 134

二、女官制度 / 140

第二节 秀女反抗与宫人命运 / 145

一、拉郎配与秀女反抗 / 145

二、宫人的悲惨命运 / 149

第三节 明初宫殉制度 / 156

一、宫人从殉始末 / 156

二、从《明史·列女传》看女性贞节观 / 161

三、英宗废宫殉 / 166

第四节 后宫礼仪制度 / 170

一、皇帝册封后妃 / 170

二、“母仪天下”的典制 / 174

(一)中宫受朝贺 / 174

(二)先蚕与躬桑 / 175

三、舆服与卤簿 / 177

(一)衣冠服饰 / 177

(二)辇舆与卤簿 / 178

四、丧葬、寝陵与溢法制度 / 181

(一)丧葬礼仪 / 181

(二)地下宫殿 / 183

(三)陵寝制度 / 185

(四)后妃溢法 / 189

第五节 祖制家法与后妃的政治活动 / 192

一、严禁后妃干政 / 192

二、后妃的政治活动 / 197

第四章 帝国皇权之盛衰 / 209

第一节 “明世酷虐臣下，莫如廷杖” / 209

一、廷杖制的缘起 / 209

二、“血溅玉阶，肉飞金陛” / 210

三、廷杖制的实质：士可杀亦可辱 / 216

第二节 加强皇权的工具：铁券制度 / 219

一、铁券制的滥觞 / 219

二、铁榜文对铁券特权的制约 / 222

三、“朝登盟府，夕系槛车” / 228

第三节 重文轻武：军事体制检讨 / 234

一、重文轻武的体制 / 234

二、战略抉择的失误 / 237

三、军事体制的弊端 / 239

四、人不敷出的财政危机 / 242

第四节 新藩镇的崛起：左良玉起兵“清君侧” / 244

一、“清君侧”的历史背景 / 245

二、左良玉为何起兵“清君侧” / 247

三、“清君侧”的过程与影响 / 255

四、余论 / 257

第五章 帝王之学与科举制的中兴 / 261

第一节 帝王之学：经筵制度 / 261

一、万历朝——经筵制的鼎盛时期 / 262

二、经筵仪式及经筵讲官的选拔、待遇 / 267

三、经筵与皇权政治及内阁关系 / 271

第二节 嘉靖新政：科举制的全面改革 / 277

一、整顿科场文风，加强乡试 / 277

二、发展武举，完善科举体系 / 281

三、倡行三途并用，提高学校素质 / 284

四、科举革新的意义及局限性 / 289

第三节 “一言以为月旦”：复社与晚明科举 / 294

一、复社科举之成功 / 294

二、科举对复社及晚明政局之影响 / 299

三、复社科举成功之原因 / 301

第六章 近世社会的胚胎 / 306

第一节 东南名邑:松江府在明代的经济地位 / 306

一、松江之富甲天下 / 306

二、松江民众的沉重负担 / 311

三、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 315

四、上海港的开辟与上海的繁荣 / 320

第二节 见微知著:乌青镇的经济文化与社会风尚 / 324

一、乌青镇的历史沿革及发展原因 / 325

二、乌青镇的经济功能 / 329

三、乌青镇的文化结构 / 334

四、乌青镇的社会风尚与习俗 / 337

第三节 南粮北调:元明时期的南北海运 / 339

一、元代海运的曲折历程 / 340

二、海运对沿海城市发展及社会经济的影响 / 345

三、锁国与开放,海禁与海运的博弈 / 348

第四节 师夷长技:火器的发展与运用 / 355

一、西式火器的引进与仿制 / 356

二、“凭他那个城池,怎挡得起红衣大炮狠攻” / 359

三、明代的新军事变革 / 363

附录:开拓中国古代制度史研究

——朱子彦教授访谈 / 368

参考文献 / 382

第一章

帝国创业之主与守成之君

第一节 罢相尊君：朱元璋与“胡蓝党案”

“胡蓝党案”是明初的一大政治事件，对明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了解这一事件，对我们从根本上认识明代皇权政治有着重要意义。但《明史》、《明实录》等史籍都为尊者讳，掩盖了“胡蓝党案”的真相，笔者拟就“胡蓝党案”发生的原因，朱元璋为何要制造此案，以及这一事件对明代社会造成的影响作一探讨。

一、“胡蓝党案”真相

如果说朱元璋在打天下时，把全部精力集中于剪灭群雄，推翻元朝的统